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主 编 张诗亚

副主编 倪胜利 刘冬梅

風 綠 山 野



黔东南教育人类学考察论文集

FENGLUSHANY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風綠山野

——黔东南教育人类学考察论文集

主 编 张诗亚

副主编 倪胜利 刘冬梅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绿山野：黔东南教育人类学考察论文集 / 张诗亚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633-9312-1

I. 风… II. 张… III. 少数民族教育—教育人类学—考察—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集 IV. G759.2-53
G40-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5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2 字数：219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它无处不在,诚如杜威所言:“教育即生活。”教育的这种活的性质决定了唯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保证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只有在一定理论、规范的指导下,深入活的教育中进行田野考察,才能获得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鲜活资源,民族教育研究尤其应当如此。

活的教育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经历着生命的成长过程,在这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有学校教育、社区教育、族群教育、家庭教育、宗教教育等。大量的媒体也在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教育。由此可见,不只是学校里才有教育,更不只课堂教学才是教育。我们研究学校教育是应该的,而且现在研究得还远远不够,但是,如果把学校教育看做人类教育的全部,只把研究学校教育问题当做教育研究的全部任务,那就有些偏颇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和体会就会发现,人的很多情感、态度、价值观并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多种教育因素影响使然。可以说,教育存在于我们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有了人类,教育就产生了,而学校教育的出现则是很晚的事情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教育是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比如学校教育;而有的教育则是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的,它们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显性的计划安排,是隐性的教育。教育不同于科学实验,不能把教育等同于教育实验,而简单地认为“没有教育实验就没有教育科学”。

因为科学实验所谓的“科学性”无非就是实证性,但是过分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上的实证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验的前提是离析出整体的、复杂的研究对象中的个别因素,予以控制,人为地予以布置,以便抽象出可以精确测量的因果关系,看看人为地施加一个“原因”能引起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科学实验你做也行,他做也行,只要那样做,就能得出一样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实证性。这样的实验,因为其客观、精确,能消除研究主体带来的“误差”,能保持价值中立,能得到精确数据,能够切实地证明假设,也就是能够被证实,所以引发了实验科学。这样的实验,在自然科学上非常有效,非常重要,以至于成了衡量自然科学是否真正科学的标准。然而,把这样的方法搬运到教育研究上来,用它来衡量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那就错了,就是唯科学主义的做法。

教育学是什么呢?教育学是研究人的培养的科学,是从培养人这个角度研究教育的。培养人什么呢?我们常常认为教育就要教给人科学知识,这样说显然是不够恰当的。如果所说的科学是指西方科学的话,那无异于在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教育,因为所谓的科学从西方传入中国才短短的几百年,变成所谓系统的学科时间更短。那点科学与人类的其他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全部相比,分量很轻,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把它当成主要的。这点科学非常有限,用它来处理我们具有独特性的生产、生活和研究更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用这样一点科学来教育人、来研究教育,恰恰就谈不上真正的科学。教育学的“学”在哪里,有哪几条规范才算是“学”?恰恰那些有着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人弄不清这个问题,弄不清教育学的“学”之独特性,这是真正的不懂科学。他们“缺什么就吆喝什么”,科学不够就吆喝科学,可吆喝了一通还是不科学,充其量是一个不自觉的实证主义者、唯科学主义者。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批评这些人,甚至是一些被人们看做“专家”的人,因为这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呢?这并不只是简简单单一个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在教育当中搞科学实验,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层面上,是必要的、有效的。但是教育中充满了价值问题,那种价值中立的实验就可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即你有没有权力把这部分人当实验对象,不让那部分人去接受实验。人的发展都是平等的,从法律上讲,你没有权力这样去安排别人的命运,左右别人的命运。而且教育实验是以将研究对象简单化处理为前提的,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环境是什么?现在的孩子们都是在电脑、电视等庞大的媒体网络轰炸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认知环境、所思、所想

跟我们以前大不相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建立一些假设去实验,然后再根据这样简单化的实验结果去看待教育、安排教育。这教育太复杂了,我们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找个定律、规律去推广就行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灵丹妙药,所以教育实验结论经常难以服人。让人家常觉得你认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科学性。

教育学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一门科学,因为它是研究人的发展和培养的。把教育学当做一个科学门类,与其他学科并列,是科学分类上的一个误区。教育问题具有综合性,教育研究就具有跨学科特征。跨学科不等于多学科,跨学科也不是几个学科简单加起来。因此不是有关的几个学科各自研究自己关心的特性,把结论加到一起就是教育学。“跨学科”这个词汇虽然建立在现有的学科分类话语基础上,其实是一种对其涵盖的学科领域界限的模糊,是一种多个学科在综合性原则下的结合,不是“各自为政”的那种多学科的简单累加。这就像对于瀑布:物理学家可能看到的是势能;化学家可能想到的是其构成,如水分子之类的东西;地质学家谈的是地质地貌;气象学家想到的可能是雨水与瀑布水流大小的关系。可谓见仁见智,但仔细想想看,人类要真正认识一片瀑布,就要综合各个学科对瀑布的认识才行。否则,就是片面的,就像寓言故事中盲人摸象一样,只抓了一部分。分学科研究,是典型的“屠夫”式的研究。而对人发展和培养的研究是不能将研究对象“切开”进行的。仔细想想,人的发展很多是“隐”的,是慢慢显现出来的,而且还伴随着不断的变化。“隐”的东西它不一定能说得出来,更不一定可以用确切的行为表现出来。不断变化的东西,就带有不确定性,用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去研究它就不能奏效。

在教育学研究领域里,著名的美国学者斯金纳发明了教学机器。他以前想研究人的灵魂,研究以后发现研究灵魂不可行,应该研究抓得住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行为。所以他认为研究控制人的行为进而实现人的发展应该是可行的,于是他的研究重点就放在了研究人的行为上。这点他是从研究动物身上得到的启示,这就是著名的“斯金纳箱”实验,工具性条件反射由此产生。这种简单的刺激与行为的关系问题,心理学可以进行实验,因为他控制的是行为,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调节这种行为。但是,人的发展和培养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大量的人的发展和培养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行为问题,人比动物要高级得多,有关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仔细区分人性的东西,可以看到,理性思维只是人性的一部分,按照以前的传统分法应该还有感性。在我看来,这种两分法还有问题,恐怕除了理性与感性外还有激情和冲动。在人类的很多活动,包括创造活动中,这些多方面的人性都

会参与进去或表现出来。正因如此,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去研究人类及其活动太不够了!

人类的活动充满了活的教育,研究它不是从我们现在的书本、学科规范出发,而应该实实在在地走进生活,只有走进去得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但研究教育的人与不研究教育的人走进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人谈的只是零散的感受,充其量只是思想的火花,这不是研究。我们强调走进去,不是要抛弃理论指导,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理论前提,不可能没有个方法论基础。但是,不走进去,不去研究那活的教育,只逗留在既有理论的圈子里,怎么从活的教育中找出能够升华的东西?研究那活的教育,走进活的教育,才是“学”的发展之源。教育学的发展只能从活的教育中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整个教育学界都做得不够好。田野考察就是要人们走进活的教育,它不只是民族教育研究的一种特定研究方式,对整个教育研究来说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式,是其他研究方式和方法不可替代的。从事田野研究,看似打乱了教学计划,获得的是一些不如书本上系统的知识,并且成本高、难度大,但是没有这样的研究,就不可能研究活的教育,就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教育学。

人类发展到现在,正开始前所未有的感觉到人类提升自己的价值意义。而人类与万事万物打交道的时候自己的能量从哪里来呢?我认为只能靠教育。可是教育学却做得不够好,没有有效地研究教育,提升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师范院校里讲的那些所谓的教育学,近乎是陈词滥调。在那里学生学的只是一些过时的体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人类的教育需要理论指导,需要我们去研究它,这个活的教育中的活的问题太多。现在的多媒体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人类学习、心智、情感的发展影响很大,这些活的东西我们不去研究,还在遵从由苏联、日本、美国传过来的教科书,把中华民族的教育大业建立在别国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不但是很不明智的,而且是危害极大的。所以教育学要活,只能从自己的土壤中去“化”人类已有的知识,去研究活的教育,才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教育学的正确道路。“学”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个转化环节——田野考察,走向生活。没有这个活的研究,很多话则是空的。所以我们在掌握学术规范后,一定要身体力行,走进我们活的教育当中去,从而整合、检验、提升自身的知识。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教育学的活来自活的教育,它的转换一定是实实在在的田野考察。教育不可能像科学实验那样人为地布置,它相当程度上是原生态的存在状态。尤其是民族地区,这个“田

野”还不是狭义的民族考察,民族考察只是对宗教、族群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的一个集中体验罢了。倘若我们研究者的眼光真的向下,走进活的教育,解决它、思考它,哪怕失败了,不能上升到“学”的层面,那也没关系,但是一旦提升出来,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就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才是有生命的,这样才能使教育学“活”起来。我们仅仅是在这条路上开了个头,主要是提高了认识,提出了一些问题,要说做,那还早得很,要能做好,就更须时日,但是不做就永远没有光辉的前景。

张诗亚 谨识

目 录

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变迁的教育人类学思考	倪胜利 / 1
西南民族教育的文化生态基础及研究目标	蒋立松 / 14
民族文字教材与教育公平	尹国杰 孙振东 / 20
侗款的教育意蕴	刘冬梅 / 29
侗族习俗中的德育	吴 军 / 40
论西南民族地区生态道德教育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王付欣 / 55
困与生——贵州凯里市南花村旅游开发人类学调查	田应仟 / 64
特色教育的构建——和谐黔东南自然与人文良性互动的诉求	罗利群 / 70
刍议民族师范教育发展的困境与策略	朱学文 / 79
旅游开发中的民族文化变迁——基于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的田野调查	贺能坤 / 89
传统的存在及意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所见民俗、信仰为例	陈 雪 / 97
从文化变迁的视角看民族地区文化现象	刘 翔 / 108
试析苗族银饰的文化特征——以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为例	邓 桦 / 120
从黔东南苗侗民族文化 传承现状看民族文化的发展观	张国栋 巴登尼玛 / 127
田野考察中图像资源的采集——以黔东南苗族服饰考察为个案	徐红梅 / 134

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刍议——从黔东南凯里南花苗寨谈起	周永平 / 141
田野调查运用于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反思	袁春艳 / 148
对西双版纳傣族基础教育现状的考察与思考	张晓燕 孙振东 / 155
民族教育研究中的田野考察法	李秀利 / 162
“在场”：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的质量尺度	顾尔伙 / 169
浅论教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教育研究——视阈与方法论的探索	翟冬园 / 176

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变迁的教育人类学思考

倪胜利^①

教育人类学是将教育研究与人类学视野及其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整合性学科,而人类学的主要方法就是田野考察。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由研究人员带领博士生到民族地区进行现场教学,边考察、边学习、边探讨实际问题,从而提炼研究的课题。这个举措打破了书斋里进行研究的枯燥和僵化的模式,有利于把握民族生活的真实脉络。2008年5月4日至10日,研究中心主任张诗亚教授带领博士生10余人在黔东南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教育人类学考察,笔者作为中心的研究人员随行,实地考察了苗族、侗族生存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亲身感受到时代变迁中的民族生存方式及其价值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黔东南教育人类学考察的启示,将为西南地区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课题提供新的视角。

一、苗族生存方式及文化价值变迁

30多年前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拖拉机进苗寨”,表达的是千百年来习惯于刀耕火种的山地民族热情迎接机械化到来的情感。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科学文化以其强大的力量迅速改变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即使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也处处可以

^① 作者简介:倪胜利,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民族科技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06JDXM200),子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传统科技传承现状调查及发展模式研究》。

感觉到新生活方式的影响,高等级公路通向村村寨寨,信息网络及其传媒将触角伸向家家户户。

321 国道穿过从江县岜沙苗寨(图 1:从江县岜沙苗寨),这个曾经封闭在大山深处的苗族部落的传奇故事搭上时代的快车传遍天下。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消费文化的滚滚红尘一波波涌来,使这个淳朴的村寨处处贴上了商业化的标签。(图 2:岜沙的图腾柱)。



图 1 从江县岜沙苗寨



图 3 岜沙男子的行头

岜沙苗寨曾被称为“枪手部落”。当地有句世代相传的谚语“一支猎枪一条狗,一枝杠子朝山走”,14 岁以上的男子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火药枪。这是保卫家园和打猎用的,而今,战争已远远离去,生计也发生改变,打猎



图 2 岜沙的图腾柱

已经被禁止,火药枪的意义发生了嬗变,它们大多数时间被用做表演时的装饰和道具。(图 3:岜沙男子的行头)。以前只是在一年一度的芦笙节时表演的歌舞,现在可根据游客的需求一天表演数次,就连女人的刺绣也成为表演项目。(图 4:等待游客的表演队)

岜沙人崇拜树。弗雷泽在《金枝》中谈及“树神崇拜”,提到日耳曼人最古老的圣所可能都是森林,所有欧洲雅利安人的各氏族都崇拜树神,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就是祭拜神树的“圣所”。^①大概世界上生存在森林中的民族都与树有着不解之缘。(图 5:岜沙人祭拜树神的圣地)在中国西南的许多地方,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树神。仡佬族八月十五拜树节,用牛和鸡等祭祀树祖;水族对生长在河畔、井边、路旁及村寨门口高大挺拔、粗壮雄



图 4 等待游客的表演队

^① [英]弗雷泽,金枝[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865,167.

伟的古树敬若神明,等等。(图6:岜沙人的生命树。图7:祭拜树神)用“巫术”一词来解释树崇拜,有指斥其为迷信的意味,未免有失简单化。历尽沧桑,经磨历劫的古稀树木之所以被崇拜,首先在于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累了更多生命信息,是跨越了遥远时空的生命系统。寒来暑往,风风雨雨,活下来的都是生命的奇迹。对这种生灵的礼拜,基于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其次,对于大自然的恩赐之物,人在用它之前,先有礼拜,然后才有屠宰和砍伐之举,敬畏之中有感恩,感恩才有仁义,仁义施之于自然界的动植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使其长养有序,生生不息,这有利于生态保护。^①当然,这都是局外人的看法。岜沙有人们所称的“巫文化”,鬼师是岜沙苗人的精神领袖,也是岜沙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之一。鬼师在岜沙的地位仅次于寨老,他们主宰了岜沙苗人部落的精神,同时也主宰了岜沙部落的苗文化。在局外人看来,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不应当被披上神秘的色彩,蒙尘的真理应当昭然于世人。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认识一个特定时空关系中的族群的文化形态、文化心理、文化传统及其传承的途径,揭示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而一个民族不断进取和自我更新的内源性动力根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参悟。



图5 岜沙人祭拜树神的圣地



图6 岜沙人的生命树



图7 祭拜树神

守住这片为岜沙人带来福祉的山林,是祖祖辈辈的生命线,岜沙精神文化的一切无不与此密切相关。(图8:岜沙人的家园。图9:岜沙的林子)以前要靠手中的火枪以及生命和热血来保护的东西,在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会面临什么潜在的威胁?2008年7月15日中央电视台10套绿色空间栏目播出了

^① 《淮南子·主术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鱼不长尺不得取,麋不期年不得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

“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的节目,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玉狮场村住在原始森林村寨里的普米人与修路者发生冲突的故事。世间流行一种说法,“要想富,先修路”,但这条路是冲着原始森林而来的。千百年来,普米人已经与这片森林融为一体,祭山神、树神、古歌、搓搓舞、古老语言,等等,一切都和森林有关。近年来,道路通到哪里,哪里的森林就会遭到严重灾难,所以那里的普米人殊死抵抗,保住了这片共生共荣的茂密森林。森林是守住了,但与外面的世界相比,普米人生活之艰辛还是有点难以承受的沉重。在很多关心生态的人们看来,这不应成为守护山林的代价,他们正在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普米人,但是村民中有些人却开始动摇了。岂沙人能否看守好这片山林?

以“长裙苗”和牛角银饰闻名的南花苗寨,接近城市,交通方便,已被开发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这里在保持着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的同时,也由于商业化影响而使人们在精神和信仰上有所迷失和惘然。穿过寨子的道路经过了一家售卖苗族服饰、金银首饰、民族工艺品的小店,一些苗民的生计问题是靠这些小店解决的,看上去同其他旅游开发区没什么两样。鹅卵石小道把游客引向几处有显著标志的地方,那是精神生活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开始传教的“南花福音堂”(图10),至今仍有众多信徒。再往前有一



图8 岂沙人的家园



图9 岂沙的林子



图10



图11

处祭坛(图11),招牌告诉人们这是苗人重大祭祀活动和“牯藏节”祭始祖的地方,但近前看,原来神龛里端坐的是财神爷,这背后真有点耐人寻味的意蕴。将赵公明元帅当成苗民的始祖,固然是制作招牌人的无知,但赵公明能安然坐享苗民烟火,也蕴含着苗

人价值追求的微妙变化。小路另一边的台阶上有一个较大的表演场地,中央立一图腾柱,艺术家费了不少心思,被崇拜的图腾都雕刻其上,有日、月、天、地、枫树、蝴蝶妈妈,还有始祖伏羲和蚩尤。这一切似乎都是为游客设计的。这个表演场地经常有飞歌、木鼓舞、芦笙舞之类的表演。(图 12:歌舞表演场)民族生活情景变为表演艺术,这是当前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热点。为着“男欢女爱”的原生态艺术与“为了



图 12 歌舞表演场

看客”的艺术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苗族人的信仰具有多元化的取向,既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又有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等,佛教、道教也被容纳到信仰之中,体现了这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前世今生的坎坷经历及其在多变的时空关系中极强的适应性。这常使人们想到经历大致相似的犹太人,他们居无定所,漂泊无依,不确定性、开放性造就了一个民族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苗族千姿百态的文化形态与其流动性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有很多被包装和拿来表演的东西都与以往游耕的生存方式所赋予的观念形态密切相关,在生存方式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苗民的真实生活中还会有什么留存下来?苗族大迁徙的时代相当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描述的人类野蛮时代^①:历经无数战乱与纷争,人类逐渐抛弃了野蛮的杀戮,开始了没有血与火的战争。外来的强势文明兵不血刃,从灵魂深处将一个民族化于无形的情形并非只是一种忧虑。20年后使苗族成为苗族的那些东西,还留下什么?

二、嬗变中的伧伧印象

时代是一个主旋律,善歌的侗族人在特定的时空中有自己的变奏。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侗族三样宝:鼓楼、大歌和花桥。”鼓楼是艺术结晶,更是社稷之魂。在以往年代,族中有什么大事,都通过鼓楼中高悬的牛皮大鼓发出的响声召集人群,集会议事和庆典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中原的农耕时代,族群的聚集是靠中央竖立的大旗,“中”字在甲骨文中写作“𠂔”、“𠂕”,我们可以看到立起一面旗以聚集族群之义。

^①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按照生产技术的发达程度,把从史前史到有史时代的人类全部历史分为以下七个时代:蒙昧时代(前期、中期、后期);野蛮时代(前期、中期、后期);文明时代。炎黄战蚩尤的年代大致在野蛮与文明两个时代的衔接处。(作者注)

平原开阔地上中央竖立的大旗住得很远的人们都可以看到,而在山地,要使较远的人们得到信息,鼓声就有独特的作用了。今天人们来到侗寨看到的鼓楼,多是欣赏它的建筑艺术及其雕刻与绘画,它成了一个标志与符号。(图 13:肇兴鼓楼夜景)在肇兴侗寨,鼓楼里已经不再悬挂大鼓,信息时代的传递方式比鼓声有效得多。一些鼓楼成为经常性的表演场所。



图 13 肇兴鼓楼夜景

花桥就是风雨桥,是最具特色的侗族建筑,其造型和建筑之艺术性自不必说,其对于侗族人文生态的形成之作用尤为重要。在外人眼里,那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地方,是一个行歌坐月的好去处。“行歌坐月”是一种古朴的社交活动,是青年男女进行交际和谈情说爱的通称,侗族男女青年到十四五岁便开始这种活动。在能够满足一切欲望的都市丛林,无处发泄的青春活力会寻求霓虹灯下的醉生梦死、摇滚乐中的糜烂疯狂;而侗寨里少男少女的浪漫情怀,则在明月繁星的天空下和寂静的山林背景上得以抒发。一个奢靡,一个淳朴;一个堕落,一个升华;



图 14 老年人用异样的眼光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

前者留下精神与躯体的塌陷,后者激活生命与创造的原基。不过,这种情景也在逐渐淡出生活,成为越来越遥远的回忆。(图 14:老年人用异样的眼光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如今一些年轻人不再以那种原生态的方式表达爱情,他们在装饰豪华的歌厅里狂歌劲舞通宵达旦。一些年轻人觉得歌厅、网吧比风雨桥更有吸引力。在肇兴侗寨,人们看到风雨桥上闲坐的大多是老年人和孩子。(图 15:“邂逅”

歌厅与“仡伶印象”馆)

侗族大歌是自 20 世纪晚期以来侗族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事物,这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1986 年贵州侗歌合唱团赴法国演出侗族大歌引起轰动,扭转了国际上关于中国没有复调音乐的说法。

侗族没有文字,迄今人们知道的许多有关侗族在遥远时代的故事,都是以歌唱方式流传下来的。



图 15 “邂逅”歌厅与“仡伶印象”馆

在有文字的民族中,文化传递的方式通常与著述和阅读相关,教育文化所创造的宏大景观都与文字具有密切联系。而在侗族,文化传递的方式就是歌唱,这也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文化形态,它形成于特定时空关系中特定的族群。有关天地起源、日月起源、人类起源、侗族祖先、谷种起源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阐释通过歌唱一代代传下来。歌师是侗族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具有对话语的解释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和途径进行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系统所产生的结果大不一样。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靠的就是这种文化传承方式,而今天的学校教育系统,推行的是一种趋同性的教育,它使民族的东西日渐式微。怎样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教育人类学需要着力探讨的课题。

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追问:大歌究竟起于何时?据有关的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话:“辰、沅、靖州蛮,有伧伶……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于前导之。”再就是明朝邝露所作的《赤雅》一书,其中描绘的“侗……善音乐……长歌闭目,顿首摇足”的演唱情景,与现在侗族地区男声演唱大歌的情形完全相似。侗族生存的资源环境有其独特性,山寨大多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流水潺潺。“泉石激韵,林籁结响”的自然生态能诱发音乐创作的激情和灵感,谛听大自然的韵律,从中模拟鸟叫虫鸣、高山流水等大自然之音,是大歌创编的一大特色。时下人们听到的大歌,其内容主要是关于自然、劳动、爱情以及人间友谊。编创、演唱、比赛、交往等与大歌相关的活动,提升了侗族青年男女的思想感情,激发了其创造力,激活了生命的原动力,保存了真善美的思想内容。因此不少人都说,在大歌流行的侗族村寨,很少出现打架骂人、偷盗抢劫等不良行为,在很多村寨几乎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文之美与自然生态之美有机融合,很有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的遗风。

族群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会产生融合现象并导致一些变化发生。侗族文化传承的方式除了歌唱也有过“汉字记侗音”的历史。明初时侗族地区就开始受汉人“养晦读书,化及地方”的影响。到了清代及民国时期,侗族地区出现了一批既懂侗歌又识汉文的侗族文人,双重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们开始采用汉字记录侗族语言。至今在侗族民间还保存着不少以汉字记侗音的“大歌歌本”。今天的侗寨与西南地区许多民族村寨一样,到处都可以使人感觉到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肇兴花桥上的剧情画大多取材于汉人的经典故事,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故事,当然,也有一些侗族的风情画。由此可见汉文化的影响与侗族吸纳汉文化的现象。就连大歌本身也有点与原生态的东西不一样了,我们不断听到按照对位和声法则编制的大歌,还有电声乐器伴奏的大歌。大歌也在逐渐脱离生活,走向舞台,与各种各样的“秀”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